

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

廖 群

高亨先生(1900—1986)是我国20世纪著名学者。1923年,他二十三岁离开吉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为该研究院首届研究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开始走上文史研究之路。之后,他辗转吉林、河北、河南、四川各大学。建国后,高先生经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引荐执教山东大学,成为山东大学古典文学“冯陆高萧”四大名教授之一。高先生六十几年如一日,一直过着“三书”(读书、教书、写书)生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求学经历,尤其是更多得益于王国维的影响,高亨先生确定了自己“遵循朴学方法”为主的治学方向。通观其研究成果,最明显的特征是借助文献考据方法研究先秦诗文典籍,无论是在字句的考释还是在相关学术问题上,均能通过充分考证,发前人所未发。颇令人称奇的是,时隔几十年,有些疑难或争议的问题,诸如《周易》的重卦时代及《周易》之外的筮书,《老子》、《庄子》、《晏子春秋》的年代,《诗经》的分类等,高亨先生提出或坚持的观点,大都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高亨先生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老子正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注》、《诸子新笺》(含《墨子新笺》、《庄子新笺》、《荀子新笺》、《韩非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商君书新笺》)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尤以在易学研究、先秦诸子研究、《诗经》研究及古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建树,奠定了在我国学术史上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①。这里仅以考古发现为视点,集中述及高亨先生几个已被印证的研究,并以此为契机,见出其文献考据法的要义之所在。

一 文献考据的主要成就

高亨先生在《周易》、先秦诸子、《诗经》方面的一

些研究,已经得到考古发现的印证。现先分述如下。

1. “八卦”重卦的时代

八卦、六十四卦的起源古来附会极多,迄今仍是易学研究中的难点。高亨先生《周易古经通说》第一篇《周易琐语》论及这一问题,其中对于“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他考定“至晚当在殷代”已经“用于占筮”,从而显示了殷商“卜筮同用”的史况^②。因为据《世本》和《吕氏春秋》,知巫咸作筮(郑注引《世本·作》云“巫咸作筮”,《吕氏春秋·勿躬》亦云“巫咸作筮”);据《尚书》知巫咸殷人(《尚书·君奭》云“在大戊时,则有巫咸义王家”);据《礼记》知殷有重卦之筮书《坤乾》(《礼记·礼运》记殷有遗书名曰《坤乾》,从坤乾二字观之,此乃筮书)。在此论证基础上,高亨先生指出:“由此可见,谓重卦之事至晚当在殷代,虽无坚确不破之明证,亦据先秦相传之故说,尚不至大谬矣。”

《通说》写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重卦占筮“至晚当在殷代”的判断在后来陆续发现的殷代数字卦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河南安阳四盘磨村一卜骨刻有三组符号,第一组为“七八七六六七六曰隗”,以阴阳爻表示,为“未济”卦(上离下艮),第二组为“八六六五八七”,为“明夷”卦(上坤下离),第三组为“七五七六六六六曰畏”,为“否”卦(上乾下坤),其年代在殷康丁时期^③。山东平阴朱家桥9号商末墓陶罐上有卦画符号“一八八八一”,可隶定为“损”卦(兑下艮上),殷墟陶簋上有卦画符号“七八八八七七”和卦画符号“八八七八七一”,可分别隶定为“损”卦(兑下艮上)和“归妹”卦(艮下震上)^④。还有殷墟一块卜甲上刻有三组卦画,一为“七七八七八八”,即“渐”卦(艮下巽上),并有“贞吉”

① 董治安《高亨先生传略》,《高亨著作集林》第十卷《附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420页。

② 《高亨著作集林》第一卷,第29页。

③ 曹定云《殷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第2期。

④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二字；一为“八七七八八”，即“蹇”卦（艮下坎上）；一为“八七七八七七”，即“兑”卦（兑下兑上），被认为“兑”卦和“蹇”卦为先筮所得，其结果不理想，因而筮第三次，得“渐”卦，“贞吉”^①。这些殷商时代的重卦符号和占筮记录，无不印证了高亨先生的判断。

2. 《周易》之外的先秦筮书

《周易琐语》还论及了周代《周易》之外存在其他筮书的问题^②。对此，高亨先生首先列举了先秦文献关于其时有不同筮法的记述。接着，他列举了汉代人提到《连山》、《归藏》的材料。第三，列举汉代人曾见到这些筮书的证明。如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云：‘《历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又《御览·学部》引《新论》亦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春官·太卜》）《礼记·礼运》郑注谓《归藏》书存。”第四，找到战国儒生曾见《周易》之外筮书的证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坤乾》之义，《坤乾》之义，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高亨先生认为这段话不一定是孔子所言，乃孔子后学所拟。不过，“虽非孔子之言，然可以证明战国儒生曾见夏代历书，名曰《夏时》，曾见殷代筮书，名曰《坤乾》”。第五，更进一步，还在先秦史书中找到不见于《周易》的筮辞，以证明先秦时代《周易》外的确别有筮书。《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成公十六年》：晋侯伐郑，楚子救郑，“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高亨先生指出，其筮辞均不见于《周易》，所据自是别种筮书，或即《连山》、《归藏》与《坤乾》之类典籍。最后，又用汲冢竹书加强论证：“又《晋书·束皙传》载：‘汲冢竹书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此亦《周易》外一种筮书，可断言也。”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类简文^③，比如：

□明夷曰：昔者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天，而支（枚）占□（193）

券曰：昔者殷王贞卜其邦尚毋有咎，而支（枚）占筮（巫）咸，筮（巫）咸占之，曰：不吉。券（卷）其席，投之潞（溪），卷在北，为牝□（213）

经学者研究，它们就是古籍中提到的《归藏》^④，多见于严可均所辑《归藏》的前三部分，即（1）不著篇名的筮辞；（2）《归藏启筮》；（3）《归藏郑母经》。秦简《归藏》的出土，说明古人所云《归藏》绝非子虚乌有，战国秦汉间尚在流传使用。也印证了《周易》之外尚有《连山》、《归藏》之类别种筮书存在的说法。

3. 老子及《老子》的年代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本传中提到三位老子：一是“姓李氏，名耳，字聃”的老子，即春秋末年孔子曾问礼的老聃，并明言老聃“著书上下篇，言道之意五千余言”；二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三是战国时代的周太史儋。并提到“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从宋代疑古思潮开始，历代都不乏对老聃及其著《老子》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者。或从老聃与《老子》的思想矛盾分析，认为世传《老子》与春秋时的老聃在思想倾向上有所不同；或从《老子》一书本身的观念和用词分析，认定该书乃战国所作；或从《庄子》、道家与老子的关系着眼，论证老子是《庄子》所造或《老子》是《庄子》之后的产物；或从肯定太史儋的角度，否定老聃即著《老子》的老子。高亨先生是自始至终肯定老聃著《老子》的论者之一。在《史记老子传笺证》中，他提出《道德经》决为老聃所作，并举六证以明之^⑤。后来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更在新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早期的论断，即“《道德经》一书是老聃所作”，只是书传之后又“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⑥。这和其他肯定论者所称该书集成于战国中期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具体来说，高亨先生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不独详尽列举了战国诸书引《老子》一书语句的材料，还特别发现了其中许多引用提到老子或老

①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② 《高亨著作集林》第一卷，第30—32页。

③ 《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④ 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⑤ 《老子正诂》，《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第197—233页。

⑥ 《编外论文辑存》，《高亨著作集林》第十卷，第321—333页。

聃作的证据。如他指出,《庄子·寓言》曰:“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见《道德经》四十一章。《天下》称:“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见《道德经》二十八章。此二处径作“老子曰”、“老聃曰”。他分析,如果说《庄子》多有寓言不可尽信,《天下》一篇绝无寓言,是完全可信的。他还指出,《吕氏春秋》虽不称“老子曰”,但在《不二》中云:“老耽贵柔。”对此他分析说:“吕氏此言,必非无据。察老聃贵柔之旨,具在《道德经》中,则发此评者,盖尝见《道德经》矣。”这就比一般单纯使用战国典籍引用《老子》书的材料,在作者判定方面,论证更加充分和确定。

第二,在据文献考察论证《老子》书早出时,他又发现了新的论据,即《墨子》已经引用过《老子》。这正是他断《道德经》决为老聃所作六证中的第一证:“《太平御览》五百十三卷引《墨子》曰:‘《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见《道德经》四章。今本《墨子》无此文,《御览》所引当在阙篇之中。是墨子或其徒已见《道德经》明矣。其证一也。”上述关于诸子引《老子》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老子》并非战国末年之作,却并不一定证明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之作;而用《墨子》引《老子》的材料,证明此点就增加了极大的可能性。

第三,高亨先生在对战国及秦汉各种典籍征引《老子》的材料全面排比后发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就周秦两汉人所引,知周秦传本与两汉不同,两汉传本又自不同。”这对于理解《老子》一书的复杂情况及战国色彩,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亨先生还通过对文献的发掘和考证,揭示出老聃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从而为孔子见老子的时机提供了佐证。这一发现来自对《左传》中一条关于老阳子的记载的释疑。《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冬十月……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杀甘悼公(即甘过)而立成公之孙鲔,杀……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綽、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一个“及”字,给人的印象是包括老阳子在内的五人都在这场周贵族的权力纷争中被杀。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又记王子朝争位失败后“阴忌奔莒以叛”;《昭公二十一年》记伶州鸠评论周景王,《国语·周语下》记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伶州鸠与景王两次对话。高亨先生认为伶州鸠与刘州鸠当是一人,伶是官名,刘

是姓。这里阴忌与伶州鸠二人的事迹都发生在上述所谓被杀事件之后,总不至于是死而复生。这只能说明,上引所谓被杀一段的文字一定有问题。高亨先生由此断定,其实五人并没有被杀,“及”应是“反”之讹,“反”是“召回”之意。也就是说,上述那段记载应是说成景之族杀了甘悼公、庾过、瑕辛,召回了此前因某种原因而逃往别处的五位朝臣。从文献来看,“及”与“反”因字形极近而致讹的情形并不少见,高亨先生就列举了《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反”字误作“及”的两条材料以证之。令高亨先生对这一发现感兴趣的是它证明了老阳子的没有被杀,进而就可以把他和老聃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了。老阳子与老聃同时,都姓老,都在周王朝供职;老聃又有字伯阳之说,因此,这位老阳子很可能就是老聃。而且,联系到《礼记·曾子问》中孔子在巷党见老子的记述,高亨先生推知,老阳子当时去周后所至之国即鲁国。这一发现解决了《礼记·曾子问》所提孔子问礼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也就回答了否定论者就此提出的质疑。

近年考古有几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其中所见《老子》的传本,正在陆续印证着高亨先生的考定。先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墓中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不同,可知不是一个传本;同墓出土的甲本和乙本,它们又有不同,也不是一种传本。后来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其中的简本《老子》与帛书本和今本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首先便证明了高亨先生在文献考察时所发现的《老子》有多种传本的事实。既然有多种传本,论战国色彩为后人所加,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最关键的还是郭店楚墓简本《老子》的出土。据介绍,这座墓的位置在楚国郢都外墓地范围之内,这一带楚墓的序列已经排定,足以说明郭店一号楚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①。这个时间起码证明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而且,墓中出土刻有“东宫之帀(师)”字样的漆耳杯,证明墓主当是楚国宫廷某位太子的老师,这些典籍应是他生前所用,其时间更应早一些。在古代交通不便和典籍需要辗转传抄的情况下,《老子》一书流传至楚国,是需要相当时间的。这个时间段对于已近战国中期的周太史儋作《老子》的说法是十分不利的,而对于高亨先生所坚持的老聃著《老子》的说法,却是十分有力的证明。佐之以《墨子》已经有征引《老子》的内容,《论语》中“以德报怨”一语很可能出自《老子》,

①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老聃著《老子》之说就更增加了几分砝码。更为重要的是，简本《老子》本身也证明了它的早出，且证明了它极可能就是春秋末年老聃所著《老子》一系的传本。因为对照今本《老子》，有研究者已经发现，简本《老子》应是《老子》原始本，而今本《老子》乃是在此基础上的增修本^①。

简本的发现，解决了老子及《老子》研究中最令人迷惑的战国色彩问题。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原始本《老子》并没有一定是战国时代才能有的内容，今本《老子》中的“万乘之主”等战国的词汇和内容，的确是后人增补时所带，所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之类明显与儒家针锋相对的语句，也不见于简本，这就为肯定该原始本《老子》为春秋末年老聃所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4. 《庄子》的成书时代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和杂篇是庄周后学所作。但也有意见正相反，认为外杂篇是庄周所作，内篇晚于外杂篇，乃汉人所作^②。至于外杂篇，更有多篇被怀疑是汉代人所作。比如罗根泽、张恒寿等就断定杂篇中的《让王》袭自《吕氏春秋》^③。

高亨先生并没有直接参与问题的讨论。不过他在《庄子天下篇笺证》前言部分，明确指出该篇为战国时人所作，因为“其文有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荻、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侔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所谓‘至今不决’之‘今’确指战国时代，因战国以后，墨徒之名辩、巨子之相传，则已绝矣”^④。在《庄子新笺》的前言中，更以简洁而充分的论证，从整体上肯定内篇先于外杂篇，乃庄子所作，肯定外杂篇大都成于《吕氏春秋》之前，从而否定了《庄子》有汉代人所作的意见^⑤。其中，他一连列出六证，充分论证《庄子》内篇乃庄周自撰，先于外杂篇。其中可谓力

证的是，他举出了外杂篇成于庄子死后的几条材料。这样，包括内外杂篇在内的整部《庄子》就都应该是先秦之作。高亨先生在论证中提到的《吕氏春秋》之阴袭《让王》（而不是像有论者所说是《让王》抄自《吕氏春秋》），后来得到了出土文献如阜阳汉简与张家山汉简的印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阜阳汉简。这批简是1977年在发掘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时发现的。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资料，考古学家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得晚于这一年^⑥。阜阳汉简中有属于《庄子》杂篇的残简八条^⑦，第一条“有乎生莫见”，在今本《庄子》杂篇《则阳》第八节：“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第二条“乐与正为正乐”，见今本《庄子》杂篇《让王》第十六节，古代“正”与“政”相通：“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其于人也……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第三至第八条均见于今本《庄子》杂篇《外物》第六节，只不过语句略有差异。对于阜阳汉简中文字，可以断定，尽管其中恰恰出现了同见于《吕氏春秋·诚廉》的“昔周之兴”一段，但它们应出自《庄子》，而非《吕氏春秋》。

首先，阜阳残简“乐与正为正，乐与治为治”，《庄子》作“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吕氏春秋》作“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比较来说，阜阳汉简同于《庄子》而异于《吕氏春秋》。其次，与阜阳汉简《让王》同见的还有《则阳》、《外物》。《外物》中也有与《吕氏春秋》相同的文字，但阜阳汉简“宋元君”在《外物》第六节，该节文字并不见于《吕氏春秋》，说明该墓这段简文出自《庄子》。还有，《则阳》也不见于《吕氏春秋》。这说明阜阳汉简中所见的《则阳》、《让王》、《外物》的确收在《庄子》一书。此时《庄子》已经成书，而且被墓主或时人转抄，并作为随葬品入土。我们知道，《吕氏春秋》成

① 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②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③ 转引自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④ 《文史述林》，《高亨著作集林》第九卷，第370页。

⑤ 《诸子新笺》，《高亨著作集林》第六卷，第55—56页。

⑥ 《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⑦ 韩自强等《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页。

于战国末,距阜阳墓只有几十年。如果《让王》袭自《吕氏春秋》,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要摘抄撰作,要流传开来,还要被作为《庄子》之文收录,然后包括外杂篇的《庄子》要成书,流传,再被墓主或时人转抄,几乎是不可能的。

江陵张家山汉简则发现有《庄子》杂篇中的《盗跖》。这一发现从时间上进一步加强了上面的论证。据介绍,江陵张家山汉简有两次出土,《庄子·盗跖》出于第二次发掘的 M136。该墓下葬年代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下限不晚于前元十三年(前 167 年)^①,其时代比双古堆阜阳汉墓还要略早一些。据发掘者介绍,该墓 C 组简共四十四支,题有篇名《盗跖》,内容为孔子见盗跖,字迹潦草,内容完整,与今本《盗跖》文字内容基本一致。这一发现也说明,早在汉初包括杂篇在内的《庄子》已经广泛流传,并被人抄录,随葬。其成书显然不会晚于《吕氏春秋》。那么,与《吕氏春秋》互见的文字,应该是《吕氏春秋》抄自《庄子》,而不是相反。

5.《晏子春秋》的成书时代

西汉已有《晏子》一书,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有所提及和征引,班固《汉书·艺文志》有著录。问题是今见传世的《晏子春秋》,是否就是班、马见到的《晏子》;还有,班、马见到的《晏子》,是秦汉还是战国的作品,都曾受到怀疑。宋代《崇文总目》称“《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晏行事而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清人管同更怀疑它是六朝人所伪造,并指定伪造者剽窃《墨子》、《管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书而成(《因寄轩诗文集·读晏子春秋》)。

高亨先生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一文^②,专门就此问题做了考定,明确提出《晏子春秋》虽非晏婴本人之书,却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前期著作,并非汉代之后所伪作。首先,高亨先生对管同提出的一个论据进行了辨析。管同指出,司马迁在《管晏传赞》中明确表示,因为当时已有《晏子》一书,所以《传》中只记晏子轶事。然《管晏列传》中记到的“荐御者为大夫”、“脱越石父于縲继”两个故事,却见于今本《晏子春秋》。由此可见今本不是司马迁时流传的《晏

子》,而是后人重新伪作。对此,高亨先生由刘向《晏子叙录》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就是“司马迁当时并未看到《晏子》全书”,“司马迁时,汉王朝所藏的《晏子》,并没有今本这些篇章”。高亨先生分析,先秦古书经过秦始皇的焚烧与禁学,散失很多。进入汉代,藏书者多各有残本。刘向校《晏子》时,所见“中书”(汉王朝图书馆所藏)和“太史书”(太史官所藏)都不是全本。刘向据其他藏本才将其补齐。可知身为太史的司马迁并未见到《晏子》全书。那么,他所见到的《晏子》没有这两个故事,因所以说成轶事;但别人藏本却有这两个故事,被刘向编入。哪能因这一点而论定今本《晏子》为伪书呢?

其次,高亨先生根据事实,分析《晏子》不会是汉后人杂抄先秦古书以作伪。第一,《晏子》二百一十五章都记晏婴言行,重见于先秦两汉古书的,约八十章左右,其余只《晏子》中才有。如果汉后人作伪,作伪者从哪里得到那八十章左右以外的材料?第二,晏子所记故事,重见于先秦两汉古书的,确多相同或大体相同之处,但是《晏子》中在人物、地点和故事情节上,也有不少特别殊异的地方。如果汉后人作伪,作伪者为什么不遵照古书而偏偏立异?又有什么根据而立异?第三,《晏子》所记故事和重见于先秦两汉古书的相比,一般是《晏子》内容丰富,情节多而且详。如果汉后人作伪,作伪者根据什么而增加故事的内容和情节?第四,《晏子》书中许多古字古义,只有先秦作品才这样用,甚至只有《晏子》才这样用,而且语言风格多古奥朴实,与汉人作品迥异。如果汉后人作伪,作伪者怎能超越时代、会用古字古义、会写古代文章,达于毕真毕肖?

更进一步,高亨先生检出《晏子》与战国他书互见部分,逐一进行对勘,以显示它们孰先孰后,从而肯定《晏子》先于这些著作而存在。比如《晏子内篇谏上》记有齐景公兴兵伐宋因梦见汤和伊尹而罢兵事,汲冢书《古文琐语》也载(《太平御览》卷三七八引)。《古文琐语》本是魏襄王殉葬之物,直到晋朝初年才被发现,乃汉魏人所未见。《晏子》所记既与《琐语》相合,可见不是汉后人所伪造。是否晋后人抄《琐语》?《晏子》所记,情节复杂,而《琐语》所语,情节简单。可见也不是晋后人抄《琐语》编入《晏子》。结论只能是《琐语》采《晏

① 《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 年第 9 期。

② 《文史述林》,《高亨著作集林》第九卷,第 292—310 页。

子》的可能性更大。再比如《晏子外篇上》有齐景公欲封孔子因晏婴反对而作罢事，亦见《墨子·非儒上》。管同认为汉后人伪造《晏子》时抄《墨子》。但《墨子》记“欲封之以尼溪”，《晏子》作“尔稽”。两词声近可通，但作为地名，“尼溪”较通俗，如果后人抄《墨子》，不会也不可能改“尼溪”为“尔稽”。《墨子》记晏婴批评孔子“宗丧循衰，不可使慈民”，《晏子》作“子民”；《墨子》“儒学不可使议世”，《晏子》作“博学不可使仪世”，都比《墨子》古奥。还有，《史记·孔子世家》也载此事，其中记晏婴的话：“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墨子》并无此文，《晏子》有而不同：“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很显然，司马迁是采《晏子》而加删减。这说明《晏子》并非像管同所说在司马迁之后。这样，就并非如管同所说，是后人杂抄战国诸书以伪《晏子》，而是这些书引用了《晏子》，《晏子》之成于这些书之前，也就毋庸置疑了。

1972年发现的银雀山汉墓残简本《晏子》^①，使这一论证得到了充分印证。据介绍，出土《晏子》等简书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其下限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因为该墓出土了三十五枚西汉初的“半两钱”，却没有发现武帝元狩五年始铸的“五铢钱”，年代在西汉武帝前期。那么，简本《晏子》肯定成书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属于当时流传之《晏子》。将简本《晏子》与今见传世本《晏子春秋》对照，可知：其一，从卷目看，今本《晏子春秋》与简本《晏子》规模相当。汉简《晏子》虽已残断缺失，但经整理尚能看到其中包含有〔内篇谏上〕第三章、九章、二〇章、二二章，〔内篇谏下〕第一八章，〔内篇问上〕第三章、一〇章、一七章、一八章、二〇章、二一章，〔内篇问下〕第二二章、二三章，〔内篇杂上〕第二章，〔内篇杂下〕第四章，〔外篇第七〕第一九章，〔外篇第八〕第一章。也就是说，今本《晏子春秋》八卷卷目在简本中已全部体现出来，无一缺漏。如果今传本是后人所伪，不可能与西汉传抄之《晏子》如此合于符契。

其二，从具体篇目看，今本《晏子春秋》与简本《晏子》的文章首尾大致相同，也不存在后人增饰的情况。总之，简本《晏子》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公案，即今见《晏子春秋》基本可以肯定是司马迁时代流传之《晏子》，是《汉书·艺

文志》所著录之《晏子》，不存在后人伪托的问题。高亨先生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

6. 《诗经》分类中的“二南”及“雅”“夏”问题

《诗经》分《风》、《雅》、《颂》三类，其中《国风》中包含《周南》、《召南》二南和《邶风》、《卫风》等其他十三风。但自宋以来，便有人把《诗经》分做四类——《南》、《风》、《雅》、《颂》，认为《南》不属于《风》，而是自成一类。其主要论据是：《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以钥不僭”句，“南”与“雅”对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见舞象箏、南钥者”，“南”单举；《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雅》、《颂》各得其所”，《阳货》又记孔子的话“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南》与《雅》、《颂》对举；《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并言“乃合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燕礼》“遂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礼记·文王世子》“胥鼓南”，这些又都是单举《南》。对此，高亨先生首先从逻辑的角度予以针砭。因为《南》属于《风》，不属于《雅》、《颂》，当然可以与《雅》、《颂》对举。如果古书《南》与《风》对举，才可以证明《南》不属于《风》，然而古书绝无此例。《南》是《风》诗的一组，当然可以单举，不仅《南》，其余十三国风都可以单举。例如《国语·晋语》记姜女引“郑诗”同时又引“周诗”（指二《雅》），这是“郑诗”与“周诗”对举，足以证明《郑风》不属于二《雅》，难道因此而说《郑风》不属于《国风》吗？《国语·楚语》又记楚成王引“曹诗”，这是单举“曹诗”，难道因此而说《曹风》是独立的一类吗？其次，就“以雅以南”“胥鼓南”，借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的考订，指出“南”又是一种乐器，略似后代的铃。据《周礼·春官·笙诗》“笙诗教……广雅”郑注引郑司农云，“雅状如漆筒，而弇口……”，指出“雅”又是乐器名。那么《鼓钟》诗与《文王世子》所谓“雅”与“南”可以解作乐器，不一定是指二《雅》和二《南》。接着，高亨先生主要是以先秦时人的看法，论证二《南》属于《风》，并一连举出了五个证据。

《诗经》分类疑难中还有“雅”字的释义问题。对此，高亨先生同意先师梁任公（启超）“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释四诗名义》）的说法，并给以论证。这一点，即“二南”属于“风”和“雅”的本字为“夏”，都在近

①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见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年发现的上博楚简《孔子诗论》^①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批战国竹简，系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收购，经文字考古学专家整理编纂，《孔子诗论》即是集中整理出来的一批专门论述《诗》的简文材料，其中多次提到“孔子曰”，显系孔子弟子或儒家后学对孔子论《诗》的转述。据考古专家分析鉴定，这批简系战国楚墓竹简，经盗掘流失到香港，其文字与郭店楚简文字近似，抄录时间应该也不晚于战国中期，确属先秦文献。而《孔子诗论》中所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关于《诗》的论述，其时间已经可以上推到春秋。从简文看，孔子论诗分论部分依次论了《颂》、《大雅》、《小雅》、《邦风》（即《国风》）中的诗篇，并没有单独论到《南》。而且，在论《邦风》时，也并没有把《南》与《风》分开，第10简提到了一组诗，显然是专论《邦风》的，即“《关雎》之改（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就是把《关雎》、《樛木》、《汉广》、《鹊巢》、《甘棠》等二《南》中的诗与《绿衣》、《燕燕》等《邶风》中的诗放在一起论的，这说明在孔子那里，二《南》并不独立于《邦风》之外。还有，《孔子诗论》中“雅”即用“夏”，第2简提到《大雅》即是：“大夏盛德也，多言……”这是“夏”为本字的实物明证。

二 治学方法与学术经验的理论价值

从上述几个个案中可以看到，高亨先生主要是借助文献考据方法以研究、解决学术史上一些悬而难决的问题，其结论大多经得住考古新发现的检验。说起来，考古发现带有偶然性，也带有局限性。上古时代的一些学术疑难不可能全部依赖出土再来解决，文献考据仍是需要借助的重要手段。高亨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文献考据只要方法得当，科学，还是能够用来解决问题的。所以，高亨先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重视证据的审慎态度。高亨先生从不轻易下结论，任何说法都是在有证据证明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在《诸子新笺》自序中说自己的这些研究，“虽然是‘用管窥天’，所见极小，但是自信没有‘无根之谈’”^①。不作“无根之谈”，正是高亨先生从事研究的一贯态度。所以，许多研究，他都以有无证据作为立论的基础或前提。比如论二《南》属于《风》，

他说：“先秦时人都认为二《南》是《风》。这有五个证据。”论证《诗经》“雅”即“夏”，在经过一步步推论证明之后，又特别强调“尤其是还有明确的证据”。论《晏子春秋》的时代，其中涉及到《管晏列传》的记述，他说：“司马迁当时并未看到《晏子》全书，这是有证据的。”他肯定《老子》决为老聃所作，因为他能“举六证以明之”。对于“内篇庄周自撰，外篇杂篇皆其弟子所述”的说法，也是因为他能“列六证以明之”。相反，如果没有十分坚实的证据，他宁愿放弃。比如据他介绍，《周易琐语》中的《八卦与六十四卦》一节，原本有“八卦臆说”一个内容，大意是：八卦是伏羲时代八个官的标志。天官所执的圭上刻乾卦，所以以乾为天；地官所执的圭上刻坤卦，所以以坤为地；……八卦原名八圭，后来用于占筮，所以其字作卦，加个卜旁。但他说：“现在因为这个说法没有确证，所以删去了。”再比如清人孙星衍有《晏子春秋》乃晏婴宾客所作的猜测，这基本符合他关于该书时代的推测，但因“无史料可征”，他说“我们不能确信”。

重视证据，还包括重视对方有无论据。比如关于《晏子》写作时代，高亨先生列出清人管同否定《晏子》为战国书的论点，批评他“未举出《晏子》剽窃它书的迹象，空洞地下了断案，怎能令人信服！”然后提到“他只有一个论据，比较有力，值得重视”，对其论据做了认真的辨析。而对于先师梁任公提出的“《晏子》是后人依托，成书年代或不在战国而在汉初”的说法，则称“没有论据，可以不论”。证据，是客观事实在文献中留下的痕迹，有证据，就意味着向事实的靠拢。所以，重视证据是科学考察及立论的先决条件。当然，证据并不都是摆在眼前的，尤其是上古时代的一些疑难问题，证据大都不是轻易可以发现的。这就需要悉心去寻找。高亨先生文献考据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以其勤奋、细心和敏锐遍找文献所能提供的各类证据。比如论《周易》之外的筮书，一连引用了《周礼·太卜》、《周礼·筮人》郑《注》引杜子春云、《周礼·筮人》贾《疏》引《郑志》、《易》孔《疏》、《易》孔《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孙诒让《周礼正义》所提《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御览·学部》引《新论》、《礼记·礼运》郑注、《礼记·礼运》孔子曰、《左传·僖公十五年》、《左传·成公十六年》、《晋书·束皙传》，共计十二条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古书、古注、古注引古

① 《高亨著作集林》第六卷，第3页。

书、类书引古书等等。再比如通过古籍对勘论《晏子春秋》成于战国，其中用来进行比较的第一部是战国中期魏襄王墓中的《古文琐语》，乃《太平御览》卷三七八所引。能够注意到类书所引汲冢书材料，可见寻找证据之细致；而肯定《琐语》抄《晏子》，对于证明《晏子》成书于距晏子不远的战国前期便成为一条力证。此外，论证《老子》战国前期已经行于世的力证《墨子》引《老子》也是从《太平御览》引《墨子》中发现的。另外，证据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当然最为有力，功夫只在于去发现。更值得称道的是间接证据的使用。这不但需要去发现，还需要有见识，能辨识。比如论《诗经》“雅”原作“夏”，用《墨子》引《大夏》，能够发现，就是佳绩；而用“季札观乐”中“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则属于辗转论证，更可见功夫之深。如果不是博闻多识，触类旁通，便不会如此善于捕捉到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信息。高亨先生曾自称当年“翻书特多，用思最深，有时通夜不眠，而兴致淋漓，不感困倦”。文献考据的成功需要这种对于学术发现的渴望和痴迷，以及由此激发的勤勉功夫。

具体到论证方法，则体现了高亨先生“用思最深”的特点。他不但重视证据，善找证据，而且善于论证。为了能充分证明一个问题，他往往多角度、多层面展开，追求论证的严密和科学。就论证角度而言，高亨先生思路极开阔，多侧面，多角度，从而形成立体论证，以加强立论的稳固性。比如判断作品时代，其论证角度包括作者考订、作品内证、古人引用、文本对勘等等多个方面。关于老聃的研究，属于作者考订的典型用例；用《庄子》外杂篇中几条庄子之后才会有说法以证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用《天下》中述墨派“以巨子为圣人。皆愿

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之“至今”以断该篇作时未出战国，则属于发现坚确之内证；用墨子引《老子》、用《吕氏春秋》引《庄子》外杂篇，证《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之前、外杂篇未出战国，又都属于借助古人引书；用《古文琐语》、《墨子》、《吕氏春秋》与《晏子春秋》比较，以证《晏子》为先，则是文本对勘的显例。对勘中或指出用词古奥浅近的差异、或见出不见于他书的引文、或对照内容的繁简，角度更是举不胜举。立体论证，更是指为解决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加以论定。上述关于作品时代的判断就常常同时用到多个角度。他如论《周易》之外的筮书，论证角度包括了古书关于三种筮法的记载、古书古注关于三种筮书的提及、时人见到过别种筮书的证明、古书所记不见于《周易》的筮辞等等，方方面面都指向了这一判断。

就论证步骤而言，高亨先生的论证注重层层推进，充满逻辑思辨色彩。一如他对证据的重视，他的推理必与取证紧密结合，每一步都有证据，步与步之间则形成逻辑推理关系。比如论殷己重卦，首先据证知巫咸作筮；其次据证知巫咸殷人，再次据证知殷有重卦之筮书。论《诗经》“雅”原作“夏”，论证路径也很明晰：第一据证论二雅都是西周王畿诗，第二据证论西周国域原名夏，第三据实说《诗经》用地域名作标题，第四论夏与雅古音相同，最后以实证证之。

上述高亨先生经过文献考据得出的结论，又获得考古发现的印证，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体现的考据态度和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些方法比起结论有着更为久远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